

CHANGSHU CULTURE RESEARCH

常熟 文化 研究

'97 卷



常熟市文化局编

封面摄影简介：

良渚文化双龙纹环形玉饰

龙是我们祖先图腾的对象。他们从畏惧龙而后崇拜龙，并以龙作为圣物用于巫术。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以黄河和长江两大河流形成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不约而同地以龙为图腾的对象。所见的有红山文化玉龙和良渚文化玉龙，形态略有区别而特征划一，提示存在着两种文化的接触与交融。

我们的先民嗜玉。良渚先民采集、开产以阳起石、透闪石为主要成分的良渚玉，制作成装饰玉器。

常熟博物馆所藏的良渚玉龙是在 1993 年 4 月与苏州博物馆联合对练塘罗墩抢救性发掘出土的。它位于墓区中心 M8 死者的中腹部，应为系于胸部之物。M8 北为该墓区规格最大、等级最高的 M7。M7 主人为部族首领无疑，M8 主人可能为执掌宗教活动的能接近神灵的巫师一类人物。该玉饰呈双龙连体状、环形，合一嘴，色淡黄，有褐红色斑，表面磨光极好，孔对钻。龙的雕琢突出龙头、眼角，形象反映出猪嘴、鹿角、牛眼等龙的特征，技法极为简练、粗犷，却显得异常生动、逼真。玉龙直径为 3.5 厘米、孔径 1.3 厘米、厚 1 厘米。据北大考古系对 M8 内木炭进行碳 14 测定，确认该玉龙距今 5250 ± 300 年，属良渚文化早期。考古专家将此龙称为“良渚第一龙”。

常熟文化研究主要著作书目

- 1.《言子春秋》（杨载江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92 版
- 2.《曾朴研究》（时 萌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 3.《晚清小说》（时 萌著）
- 4.《翁同和》（谢俊美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 5.《瞿式耜年谱》（瞿果行著）
齐鲁出版社 87 版
- 6.《庞薰莱研究》（庞薰莱美术馆编）
江苏美术 94 版
- 7.《常熟文化概论》（何振球 严明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95 版
- 8.《常熟文史论稿》（何振球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89 版
- 9.《甲午战争和翁同和》（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5 版
- 10.《黄公望研究文集》
江苏美术出版社 87 版
- 11.《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仲伟行
吴雍安 曾康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97 版
- 12.《中国近代文学论稿》（时 萌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86 版
- 13.《常熟文物胜迹》（周公太编著）
古吴轩出版社 94 版
- 14.《常熟博物馆馆藏书法集》
文物出版社 95 版
- 15.《梓人韵语》（曹大铁著）
南京出版社 93 版
- 16.《语言表达》（朱泳燊）
人民教育、江苏教育出版社 95 版
- 17.《民国官场笑林》（李炎鋆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97 版
- 18.《民国三教九流》（蒋伟国著）
- 19.《天问研究》（翟振业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93 版
- 20.《离骚自我新论》（翟振业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92 版
- 21.《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翟振业著）
科普出版社 96 版
- 22.《常熟食趣》（常熟市文联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91 版
- 23.《中小企业管理思考百题》（袁勤生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92 版
- 24.《企业形象竞争韬略》（莫君伟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95 版

常熟文化研究

文化论坛

- 常熟文化的精神传统 何振球(1)
试析常熟的传统文化精神 蒋伟国(17)
文章千古事 叶黎依、张文英(25)

文化名人研究

- 王翠年谱 王子杨(90)

文化纵横

- 略述铁琴铜剑楼瞿氏的贡献 黄国光(32)
黄宾虹游历虞山及纪游画幅考记 李 达(37)
常熟状元多擅书 周公太(41)
常熟“民器”集成普查的文化价值 苏仁杰(45)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 图书与科技信息 周照东(48)
图书馆古籍读者服务研究 仲伟行(51)

文化思辨

现代价值与审美转型	言公达(55)
-----------------	---------

书评

动物世界的魅力	
——金曾豪笔下的狼与狐	彭思远(59)
我的动物小说观	金曾豪(64)
地方文化研究的里程碑	
——简评《常熟文化概论》	王文龙(66)

文化杂俎

常熟博物馆的书法集藏	钱 浚(69)
清杜士元微雕橄榄核舟	吴慧虞(73)
琴川八馆	汤志明、曾康(75)
毛柏生和瞿氏兄弟	毛行洁(78)
林则徐小楷“郑心田墓志”浅析	杨新民(81)
海虞文化钩沉	顾鉴明(83)
钱持云先生其人其画	包福康(88)

资料辑存

常熟文化研究主要著作书目	封三
--------------------	----

常熟文化的精神传统

何振球

常熟文化是延续了 5000 多年的地点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常熟文化不仅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成就,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代代相传,成为常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影响着历代常熟人的文化创造,也激励着历代常熟文化的不断革新。

第一节 厚德载物——虞乡的富庶

一、《易经》的启示

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集中表现在先秦时代儒家经典《六经》中。后来的儒者又把《周易》列为诸经之首,认为它包罗万象,广大悉备,是先贤思辨智慧的高度结晶,在《周易·坤卦》的《象传》中,提出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观点,认为君子应以大地为楷模,以宽厚的德行,负载天下万物,有足够的容人容物的雅量,这样才能坦荡吉祥,亨通无阻。

对历代常熟的读书人来说,更容易深切地理解《周易》中所提出的这一命题,这是因为家乡的土地实在堪称丰腴肥沃,宽厚博

大。千百年来辛勤耕耘,不断提高着常熟土地的品位,使其滋养万物,物产丰富,年年富裕,岁岁常熟。常熟县名称最早始于南朝梁大同六年(540),这是因为当时人们觉察到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虽水旱不能使全部受灾加上河网密布,灌溉排泄方便,经常能夺得好收成,故尔命名。宋人杨备《咏常熟》诗中就有“岁岁丰收常熟田”的说法,元代至正年间的《重修琴川志》中也有“土壤膏沃,岁无水旱”之忧的解释,明代万历年间《皇明常熟文献志》则说得更具体:“原隰壤,虽大水大旱,不能概为之灾,则岁得常稔。”常熟土地上的物产品种经过千百年来常熟人民的引进改良及杂交培育,已达到十分丰富的程度。从农产品看,水稻为大宗,以地方品种为主,至清末农户相沿种植的稻种有 70 余种,小麦在常熟栽培历史悠久,到清末民初有地方品种 20 多个。从副产品看,常熟河湖山林中的土特产更为丰富,如果品种中的“桂花栗子”、“水晶杨梅”和“白花水蜜桃”最为闻名。虞山北麓兴福一带种植的栗树混栽于桂花树间,每届中秋时节,桂花喷香,正逢栗熟,栗肉蕴含桂香,美味异常,故名“桂

花栗子”。虞山南麓宝岩一带所产杨梅，果实滚圆，甘甜多汁，有的果大色红，名“螳螂子”，有的色白晶莹，名“水晶杨梅”。任阳镇一带栽种的水蜜桃，早熟、果大、肉厚、味甜，远近闻名。总之，常熟的土地，堪称“厚德载物”的楷模，千百年来她奉献出无限量的乳汁，哺育出勤劳、智慧和勇敢的常熟人民，也培养出丰富多采绚丽多姿的常熟文化。常熟文化精神传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基础上才得以产生的。

二、江南大粮仓

土地的“常熟”丰厚，带来了经济文化的富裕繁荣。早在北宋嘉祐、治平年间，常熟就以物产丰富、连年丰收而成为赋税大县。《吴郡志》卷三十八记载：“顺民仓，常熟县仓也。建于治平二年（1065），记于熙宁元年（1068）”。注引所叙《常熟县新建顺民仓记》云：“治平二年，河内向侯作新仓成，尝语予其始终曰：吾至之初，见太守永川陈侯。席未暖，陈侯曰：常熟，大县也。考其民版之数，至四万户。岁输之粟，至八万石。有仓，污廩迫窄，才容四分之一。滨江之民，远者百里，水浮陆走，捆载而至。仓或既盈，则累数夕而不得输于州，又病其远，此一不便。职是，岁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庑皆满。盖藏弗谨，涂既弗完，得无有以海盗哉？此二不便。盖迟君之来也久矣，君亟图之。吾退而自惟：仓廩，盖今天下郡县之先务。京师兵储、禄廩之出入，一皆仰给于东南。兹又为东南之剧，岁入之粟，它郡莫加厚焉。吾邑虽不腆，其敢后其所先务邪？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陈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视事之日，见吏民问所疾苦，尤为不便者凡几。然而献计者，又皆不出吾陈侯之议也。于是访县之北，得隙地数亩以营筑焉。始召民而谕其所以作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听命，咸愿治材于家，请期日合众材以成之。既而至期，仓遂以成。”可见

在北宋时期，常熟就以盛产粮食而出名，有东南粮仓之誉。到了南宋期间，常熟地处京畿北门，倍受重视，经济愈趋发达。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邑令陈映再为县记云：“上方驻蹕临安，于时吴门视周畿内，汉三辅，唐同、华，我旧京之陈、郑也。衣冠之所鳞集，甲兵之所云萃。一都之会，五方之聚。土腴沃壤，占籍者众。虽前代与全盛时，犹不可同年语，府邑之事，宜其倍称。况乎府库之出内，狱市之浩穰，盖不待较而知者。环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望焉。时主客以户计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万一千一百卅八。夏赋，金钱为缗二千八百，其币制合万二千六百，而奇弗详。秋租，谷粟七万余斛，乃今折帛为缗者十万二千三百，而斛则损其旧二千。邑之事，其倍称何如哉。今其邑从事于民者如是。而邑复濒海道，直故疆沂、密、莱，全市在望。刺利规恢，舟师所宿，则实居今日之要害。风樯连林，夜严震海。资粮万，以日馈给，营缮百须，以时调度。苟有不至，责且乏兴。若民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万，版籍输委，风雨寒暑不渝。……”（见范成大《吴郡志》卷38）如此富庶兴旺，堪称鱼米之乡、“常熟”之地。

三、文人的乡土之恋

常熟土地的“厚德载物”，给世代生活于此地的常熟人带来了不竭的福泽，也使他们形成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感情。历代常熟人赞美家乡的富庶土地与秀丽山河，留下了无数动情的诗篇，比如著名的虞山十八景，是典型的人文景观，其中渗透着历代常熟人对家乡美景的挚爱之情，也反映出常熟人的审美风尚与情趣。其中“破山清晓”的景点，在虞山北麓的兴福寺（又名破山寺），典出唐诗人常建的著名题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幽静，“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的情趣，至今犹存。再如“湖甸烟雨”之景，在县城

西门外尚湖之滨,昔日蟹篱茅舍,芦白稻黄,是典型的江南鱼米水乡的景象。特别是每当烟雨迷蒙之时,泛舟尚湖,遥望湖甸,虞峰隐约,烟树飘渺,村舍散布,渔舟点缀,恰如一幅泼墨山水图画。历代常熟诗人大都咏赞过“湖甸烟雨”美景,常熟画家了也大都描绘过“湖甸烟雨”的神奇景色。“藕渠渔乐”作为常熟的著名风景,更能看出常熟百姓安居乐业、热爱家乡的情形。藕渠是县城东南三公里外的一个小市集,地近昆城湖,百姓以捕鱼为副业,大多农忙务农,农闲打渔,靠辛勤劳动,换得安定富裕的生活。于是在诗人画家的笔下,就出现了“藕渠渔乐”的动人描写,每在傍晚月夜,藕渠码头渔船云集,劳累了一天的渔民船头小酌,谈笑说唱,显得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种渔家乐的生活画面最能激发起诗人画家们热爱家乡、歌颂家乡的情感,并形成强烈的创作灵感。历代常熟的地方文献中,颇多对常熟青山绿水富庶家园的讴歌。从这些热爱家乡、赞美家乡的作品中,完全能看出常熟文人对家乡土地的深厚感情,看出这方美丽富饶的土地使他们感到欣喜满意,感到自豪自信。

四、常熟文化的和谐精神

厚德载物的常熟土地,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常熟人,也使他们养成了宽厚待人、宽仁待物的传统习惯,这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常熟文化的发展繁荣。厚德载物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立世精神,主要表现出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统一,其二是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而常熟文化的传统精神,在这二方面又表现得较为突出。明人龚立本修县志云:“予邑实扬州之域,有虞仲之逊让,故其人多伉爽;有子游之文学,故其人多秀慧。壤地沃莱,赋役繁重,男耕女织,佐以渔樵,犹且日不暇给。即号称素封,大抵缩衣节食,仰奉县官。其安土重

迁,崇信鬼神,则贫与富皆然。”就指出常熟人伉爽谦让,秀慧勤快的特点。有了这种普遍的风气,人际关系容易和谐,社会也容易稳定,人民由安居乐业到安土重迁,他邑率事商贩,虞民独依阡陌力作,守邱垄而不去。子弟皆幼而读书,每有司较童子试,辄及千人。民俗重客,有客自远至,必善视之。”明弘治常熟县志载邑人李杰序亦云:“姑苏为南都辅郡,而常熟其属邑也。倚虞山以为城,环江海以为池,实东吴要害之地。其土膏腴,其田平衍,其物产殷盛,若粳、秫、布、帛、鱼、盐、蔬、果、水陆珍奇,所以供国赋而民用者,充然有余,而不资外助。自阖闾、夫差,雄据一方,虎视诸夏,而俗尚奢侈;自泰伯、子游,礼让风行,文学化洽,而人材汇出。是固江南名区,非特一郡六邑之冠而已。”都指出了常熟土地之肥沃和出产之丰盛给社会风俗带来的良好影响。中国儒家历来强调养地力和养民力,认为百姓只有衣食足才会知礼义,也只有上下都知晓礼义和遵纪守法,社会才以和谐稳定,经济文化才得以繁荣发展。常熟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常熟历来被称为“首善之区”就不奇怪了。

常熟文化的传统精神中还有着强调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思想,这与常熟地区开发较早、人民受教育较多、文明程度较高也是分不开的。常熟的先民们同样很懂得合理利用肥沃土地的各种规律,很懂得在向大自然索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大自然固有的平衡,保持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在历代的治水、治山、种植、蓄养等活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比如种树栽竹,本来是常熟土地“厚德载物”的结果,也是历代常熟人的生活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但如果砍伐过度,或光伐不种,就必然会使树林减少,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的改善。因

此,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常熟守官,几乎都鼓励促进民众植树造林,不断改善常熟的自然环境。经过历代常熟人民的持续努力,常熟大地山青水秀,绿树成行,呈现出江南鱼米之乡特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比如昔日虞山十八景中的“吾谷枫林”。就植造于明代天启年间。在虞山向阳南坡上,曾植枫树万棵。每当秋季,满山红叶,衬托在蔚蓝色的天空下,毗连着一望无际的金黄色的稻浪,鸟瞰着碧波千顷的尚湖,风景煞是好看。

常熟人在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美化自然,让生存环境艺术化,让自然山水更具艺术美,早在唐代,常熟的山林风景之美已远近闻名,如常建咏虞山三峰的诗云:

西山第三顶,茅宇依双松。
杳杳欲至天,云梯升几重。
莹魄漱玉虚,以求鸾鹤踪。
逶迤飞天人,执节乘赤龙。
旁映白日光,缥缈轻露容。
孤辉上烟雾,余影明心胸。
愿与黄麒麟,欲飞而莫从。
因寂清万象,轻云自中峰。
山暝学栖鸟,月来随暗虫。
寻空静余响,袅袅云溪钟。

可见唐代时虞山景观已非常迷人,已带上许多人工美化的痕迹。时至今日,常熟的山水更加秀丽,尤其是虞山,1987年经国家林业部办公厅批准建立虞山森林公园,1989年3月经国家计委和林业部批准,更称为江苏虞山国家森林公园。这是一座融山、水、林、石为一体的极富艺术美感的自然山林,是林业与园艺的最佳结合。它典型地表现出当代人常熟人创造和谐优美自然环境的自觉意识及不懈努力,它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前来观光游览,是国内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

五、和谐与抗争的辩证统一

然而,任何想与大自然保持和谐的设计都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在建设国家森林公园的过程中,虞山林场的干部群众化费了无数的心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终于使美梦成真,让虞山焕发出更为鲜艳的艺术光彩。他们首先是大面积地植树造林,根据虞山的环境特点和林场的经营方向,有意识地安排针叶树种和阔叶树种相结合、速生丰产树种和乡土树种相结合、成片造林和零星栽植相结合、人工林与天然林相结合,巧妙地把虞山变成了万木园,树种丰富多采,林相各具一格,既保持着一定的经济价值,又增强了山林的观赏价值。他们还努力恢复传统的人文景观景点,比如整修言子墓道,再建维摩古寺,重修四高僧墓、柳如是墓、瞿式耜墓、翁同和墓,还重修了辛峰亭、古剑阁等。为了便利游客观景,他们在市政府的支持下,修筑了12米宽的环山公路。今日游客可在言子墓道登上观光汽车,汽车盘旋上山,虞山美景,随车而转,水乡风光,尽揽眼底。

总之,富饶美丽的常熟土地使常熟人养成了厚德载物的良好风尚传统,从而使常熟文化在各种文化交流中广泛吸取外来的进步因素,进而使常熟文化本身得到不断地创新发展。

第二节 好古趋雅——琴川的比喻

一、琴川的来历

常熟别名琴川,邑志现存最早者为《琴川志》及《重修琴川志》,皆以琴川为名,可见这个别名是由来已久了。考察方志史籍,可知常熟别名琴川,盖取七弦琴水之义。在虞城北门内山麓,古有焦尾溪,发源于读书台下的焦尾泉,流经石梅、言子墓道、辛峰巷、紫荆桥而入五弦河。与五弦河平行排列的,

还有六条河道,都是自西向东,贯穿常熟城区,注入唐代开凿的琴河中,形似古琴上的七根琴弦,所以称之琴川,并作为常熟的别称。明代邑人吴讷有诗咏曰:“虞城枕山麓,七水流如弦。昔人笔嘉名,千古称琴川”。桑琳也有诗云:“七水 彻底清,听来谁解此中情?也知不作寻常调,写出洋洋政治声。”辨析诗意,说得很清楚,取名琴川是蕴含言偃“弦歌雅化”之意。其典出《论语·阳货第十七》:“子之武城,闻弦歌声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马。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这则典故脍炙人口,千百年来,常熟人以言偃名列孔门十哲而自豪,同时也自觉继承发扬着言偃执宰武城时注重弦歌咏诗的传统。常熟城里有言子墓,有言子故居、言公井、言子祠、弦歌楼等与言偃有关的遗址,而言偃在武城弦歌雅化的做法,在他的家乡常熟城乡不断得到继承。琴川的文化含义是极为深刻的,它昭示着常熟悠久的文化传统,也激励着常熟人(尤其是常熟文人)继承古老传统,创造优雅的文化特色。

二、好古的传统

常熟文化的这一特色在明代得到发扬光大。明正德年间(1506~1521),常熟诗人屈冲霄有《虞山杂咏》30首,记邑中古迹掌故,并加附注,颇能看出常熟文人中好古趋雅的风气。如

言公墨井 县治北有巷,其间有子游宅。宅中有井,井边有洗衣石,考之《舆地志》,梁萧正德为郡太守,将石去,莫知所在。

言公墨井今安在?金谓虞城委巷旁。

文学家传多丽泽,武城波及足流芳。

派分洙泗由鄆鲁,源浚琴川历汉唐。

虽被郡人持石去,余波犹得润书香。

清权古墓 在虞山北,与齐女墓东西密迹。成化间,提学娄公谦以义起,令有司春秋二祭。

虞仲高风振古今,芳魂杳杳寄遥岑。

海虞托迹成嘉遁,天下因心付陆沈。

日向断碑留晚照,云从荒草结寒阴。

后人义起崇常祀,消尽人间屦弃心。

这两首诗分别歌颂与常熟有关的历史名人言偃、仲雍,历代常熟人都引以为自豪,视为地方文化的渊源而加以继承发扬。于是在常熟文化发展史上,逐渐形成了好古趋雅的风尚。从言偃在鲁国武城以弦歌教化士民,到历代常熟守官大多倡导风雅,推广教育,常熟的文人士大夫逐渐形成了追求典雅精巧的艺术审美习惯,进而影响到常熟的平民百姓也逐渐形成以优雅为美的审美风尚。

三、典雅的艺风

在传统的艺术领域,比如书画篆刻,园林工艺、诗歌文章等等,常熟人好古趋雅的风气是显而易见的。常熟诗人往往强调钻研艺术技巧,借鉴前人学古而化,吸取百家,故而能独树一帜,自成面目,并形成的明清诗歌史上颇具影响的“虞山诗派”。常熟书画家的好古趋雅,而表现出的根柢扎实、功力深厚也是颇有名气的,从近代以来常熟书画家的情况看,也是好古趋雅者多,即使是热心于艺术革新者,也往往先有着学古而臻优雅和艺术素养,然后才能推陈出新。今人施仁先生所纂《常熟近代书画录》一书的记载中,就很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如下面的记载:

王庆芝,为石谷八世孙,工画山水及梅花,山水仍宗家法略变。梅花别具风致略收虚谷苍劲古拙之趣。能书,楷近翁方纲,篆在杨濬叟、吴让之间,晚岁独以画梅为主。

濮蕃,山水花卉雅逸沉静,别具风神,不轻易为人作画。书篆、隶、楷、行皆精雅可人。楷、行规范晋唐;篆书亦出入杨濬叟、吴让之

之间;隶书出入史晨、曹全。尤精篆刻,师赵石而不受囿范,精研秦汉及明清诸家,刀法清雅娴熟,又工竹刻。

季厚焄,擅山水,同邑张雨生弟子,得其真传。间取吴渔山、王原祁笔意,清雅严谨。晚追倪云林,天真幽淡,渴笔尤佳,常不著一人,谓取云林遗意。

吴止后,家学渊源,箕裘克绍,性耽翰墨,精通八法。于四体书无所不工,周金汉石皆有研究,晋唐诸帖均有探讨,时重其名。

近代常熟书画界可谓名流辈出,佳手如林,其中显示最多的是像“雅洁清丽”、“苍劲古拙”、“清雅娴熟”、“设色淡雅”、“天真幽淡”、“功力精到”等一类的作品风格,从中可看出近代常熟书画家很重视学古,强调博学百家,练就精到功力,然后化古出新,臻精巧典雅的艺术境界。近代常熟书法家的杰出代表萧蜕,就更是好古趋雅的典范。与萧蜕同时代的常熟著名篆刻家赵石,在篆刻艺术方面能独树一帜,也是靠着勤学不辍、好古求雅的追求,为近代常熟风雅之士又一杰出代表。

四、民俗中的趋雅

好古趋雅的审美倾向,不仅集中地表现在一些正统的艺术领域,而且还广泛地存在于民众百姓的生活习俗及文化娱乐的活动中。比如常熟的茶馆,遍及城乡市镇,是文人雅士以及平民百姓品茗憩息乃至商贾贸易的重要场所。常熟茶店的环境布置同样显出古色古香,雅致清洁的特色,其中不少还经过文人骚客的艺术加工。比如常熟早北门城门口新公园内的“环翠小筑”茶室,内厅设茶室雅座,室内名人书画补壁,琳琅满目,极为雅致。在此啜茗,近可观赏四壁书画佳作,远可眺览虞山丛林风景,令人心旷神怡。当年茶室内厅还置有丝竹乐器、各类棋盘及文房四宝,以供茶客即兴抒情发挥。大厅在夏天

又常辟为书场,聘请评弹艺人专场演出,颇受书迷茶客的欢迎。

常熟城里的书场茶馆呈现出清幽雅致的环境氛围,常熟农村乡镇的书场茶馆同样也是颇为讲究文雅传统所感染,又为此地的繁荣景象及风俗人情所激动,从而创作出脍炙人口的佳作。比如清代著名弹词艺人马如飞曾到常熟城乡演出,当他来到支塘时,为支塘的秀丽风景所折服,激发起强烈的创作冲动。他即兴创作演出弹词开篇一首,题为《支塘风景歌》,用充满激情的优美语言,将支塘地区的名胜古迹和风俗人情——加以描述,以答谢支塘书迷们对他的热情欢迎。歌词如下:

昔日支川大不同,出入湖漕田舍翁。东胜桥边多热闹,都是买卖小本营。藩王府相对茶蓬子,混杂无非尽牧童。苏家堰一带渔家乐,山歌唱彻小桥东。风和日暖长桥望,帆影倒插碧波中。明因古刹多遗迹,唐幢巍巍立其中。城皇庙、玉皇宫,判官皂隶列西东,西门街道多冷落,忽听得褒寺传来撞晚钟。书院学子埋头读,早贵原藏早挂中。真静庵尼真真静,寺旁独建小三通。碾砣桥横跨城河上,可惜是南沙城堞影无踪。顾祠堂原系孝子祠,青松翠柏绿丛丛,楼台亭榭都古雅,石船前列水当中,游人走出仙人洞,小桥栏上漆朱红。南楼坐镇南街口,上供关羽楼阁中。芦塘迂回藏宿雁,全赖南桥一路通。盐铁塘中声嘈杂,欵乃声声逆面逢。观音堂旧址云庄墅,小溪缭绕紫藤中,而今夷作田园地,无边麦浪绿葱葱。虹桥本是当铺造,“源远流长”在其中。集贤桥架落盐铁口,层层石级巧玲珑。石桥弄相对西弄口,十字街道四路通。大街来往人拥挤,无非是熙熙攘攘闹哄哄。今古沧桑真变幻,世间人事尽无穷。

支塘是常熟东南的一个较大乡镇,历史悠久,因白茆、盐铁两塘交会于镇后分流,故

名支塘。自汉初开挖盐铁塘以来,就一直是常熟境内内河水运交通枢纽,舟楫往来不绝。往西北沿盐铁塘可达梅李和福山两大镇,往东北沿白茆塘可直通长江出海口,往西北可顺白茆塘直抵常熟城。支塘周围,良田万顷,水网密布,盛产稻米鱼虾,是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近代以来,常沪公路又经过支塘成为常熟与太仓、昆山、上海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更促进了支塘的发展。马如飞创作演出的《支塘风景歌》,正反映出清末时期支塘地区的富裕繁荣以及浓郁的文化氛围。这一方面反映出常熟社会风物已普遍繁荣,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常熟的茶客书迷们(其中大多数是平民百姓)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够欣赏比较高雅的唱词曲调。应该说,这种来自民间的审美习惯,构成了常熟文化中好古趋雅倾向的群众基础。

五、常熟的文社盛行

千百年来,常熟文化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重视传统的风尚,从而构成了好古趋雅的精神传统,这种风尚传统表现在常熟文化的各个方面,常熟文坛,诗坛上盛行结社就最集中体现出常熟文化中好古趋雅的精神传统。

封建社会中的文人,除在国家机构中供职者以外,其余的一般都以单干的方式来研究学问,他们为了增强交流,学习时艺,揣摩风气,就产生了结社的要求。文化发达之地,文人结社往往成为一种风气。明末,常熟文坛上就有拂水山房文社与应社。

拂水山房文社创始人为瞿纯仁,字元初,其状貌丰伟,有燕赵侠士之风,而为文却似时花美女。他困于仕途,不得施展才能,故构精舍于西门外拂外岩下,以为读书养性之所。一时名流,如瞿汝说、顾云鸿、邵溥等皆从其游,遂组织拂水山房文社,声名甲于吴

下。

瞿纯仁逝世以后,文社由许士柔主持,时外埠名流如上海范文荃、松江冯明珩、昆山王焕如等均入社,文社一度出现中兴景象。

应社的创始人杨彝,该社址设在唐市,社员不下数百人,太仓名士张溥、张采亦为该社社员,可谓盛况空前。

清末民初,常熟文坛上结社风达到了高潮。城内有尚齿会、虞山文社、梅社等,乡镇结社之风也很盛行。白茆镇有颀红吟社,何市镇有桂村诗社,东张镇有铁花吟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社大都出版社刊,梅社发行《梅社月刊》,颀红吟社与桂村诗社联合发行《茆桂题襟集》,铁花吟社发行《铁花期刊》,且均为铅字印刷,每期一册,可见文人对结社的重视。但这些文学社团,或因规格不大,或因存在时间不长,影响不大。

在当时常熟的诗文社中,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实力最强、出社刊最多的是虞社。说其时间最长,是因为虞社自1920年春天成立以后,到抗战爆发才结束,历时17年,这在全国文坛结社史上也不多见。说其规模最大,是因为其社员最盛时达600多人,一般总保持在四五百人左右,而且自始至终,历盛不衰,当时在常熟及在外的常熟籍文人,几乎都参加了虞社并以此为荣。说其范围最广,是因为虞社社员遍及全国,江浙两省仅占50%,其余的一半分布在15个省市,甚至在东南亚、日本、西欧、美国等地的留学生、外交官中,也有不少人参加了虞社。说其实力最强,是因为虞社社员中,多文坛宿将,如章太炎、唐文治、陈衍、樊增祥、铁基博、钱振皇等,都是虞社社员。而它的基本群众有相当部分是前清进士、举人。说其出社刊最多,是因为虞社成立以后,即出版名为《虞社》的社刊,总计出刊218

期,还选编出版过《虞社精华录》、《虞山丛书》及各种特刊、纪念册。这在当时的文学社团中,也是少见的,即使像南社这样庞大的文学团体,前后也不过出社刊《南社丛刻》23期。

虞社的出现与存在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数千年来积淀在常熟文化中趋古好雅传统的一种外在反映。

第三节 刚强不屈——虞山的象征

一、虞山的传说

由苏州城北行,进入常熟境内,便可看见横亘于前方的虞山。虞山古名乌目山,一名海隅山,因形如卧牛,又称卧牛山。在平畴百里的区域中,虞山突兀而起,南坡怪石险峻,北坡竹木葱翠,山势由西北向东南延伸,恰如一头巨大的水牛横卧在江南水乡,尚湖、昆承湖又好像是放在水牛面前的两只饮水盆,而古城常熟,就座落在虞山东端,即在这只巨大水牛的前额和唇边。千百年来,虞山给常熟人民带来的福泽是无限量的,百姓中有关虞山的神奇传说更说明了这一点。如流传甚广的“老牛伏地成虞山”的传说,新编《常熟市志》特意加以载录:

相传常熟地方原无山丘。一日,仙人牵一老牛,自东南而,刚入常熟境,老牛即伏地不走。仙问当地百姓:“此谓何处?”答曰:“万段圩”(今任阳乡)。仙人听毕,对牛摇首吧道:“万段圩太小不够你吃,起来再走。”仙人牵牛再走一程,老牛又伏地不行。仙人问当地百姓:“此乃何处?”答:“九万圩”(今常熟城内)。仙人听毕,仍对牛摇首吧道:“九万圩也不够你吃,还得朝前走。”可是老牛硬是不肯起步。仙人只得举鞭催赶。一鞭敲断牛尾,老牛依然伏地不动,仙人无奈,弃牛腾空而去。从此,伏地老牛化成江南名山——虞山。

现在远眺虞山形状宛如一头卧牛,头朝东南,尾向西北,西门外山坡上的辛峰亭犹若牛角翘首,传说城内方塔即是仙人系牛之木桩,山下尚湖乃仙人喂牛的料桶所变,连偌大的常熟城亦是仙人之牵牛绳围成。老牛为何伏地不走?只因常熟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之故。

这则传说是神奇动听的,然而在离奇虚幻中又透出一份挚情与真诚,那就是历代常熟人对自己家乡的挚爱、对故乡富饶土地的感激与依恋。历代常熟人都热爱虞山,敬仰虞山,为虞山而感到自豪,也以虞山作为刚强挺立的人格力量象征。在常熟文化的精神传统中,巍峨挺立的虞山,成为常熟文化精神中这种代代相承的浩然正气的最恰当的象征物。

二、传统的人格精神

刚强不屈的人格精神,并不是简单地由虞山险峻的外貌昭示出来的,而是在其中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立世精神——“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观念由《周易》中提出,乾卦《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先圣倡导的自强不息,就是一种不向恶劣环境屈服,永远努力向上的精神,一种靠拼搏奋斗不断进取的刚强意志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自强不息,刚正不屈的精神对常熟人的影响特别明显。明末邑人龚立本纂修《常熟县志》15卷,其中《风俗志》云:常熟“士之习诗书者,诵读之声比屋相闻,纠盟结社,蜚英海内。贫不负诺,富不易交,吐纳风流,意气横溢。表人胜士,千里命驾者比比,人物显晦殊途,或矜名节,或树勋庸,或敦学术。”可以看得出常熟文人重视品行名节的风气很盛。

这种风气,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近代女教育家宗秀松,从她的人生轨迹中,充分体现出常熟文人士大

夫自强不息,不断进取,重视自身操守的高尚情操。

宗秀松(1888~1928),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时就学于竟化女校,后入苏州大同女校师范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14年应邀返里任海虞市立女子国民学校校长,前后达14年。她抛弃条件优越、报酬丰厚的教职回乡创业,是一种高尚的人生选择。

在14年办学过程中,宗秀松身上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学校草创之初,无现成校舍,仅借塔前杨姓两间房屋作教室,始时只有两个复式班,六十四个学生,以后经过努力,学校不断发展:学舍迁至学前街学宫,1916年增办蒙养院(幼稚园),1919年增办高级班,1922年改办六年制小学,期间曾试办过附设初中与师范讲习所(后来前者停办,后者单独设校),发展到有14个班级的完全小学,规模为当时全县之首。14年中,毕业学生1356人,为乡梓输送了大批教育人才。由于其业绩卓著,受到省令嘉奖15次。

作为一校之长,宗秀松的人格力量也令人感动。建校之初,校舍简陋,她变卖首饰以作校舍修理之资,任职前七年,其个人捐资达1476元(银元),而同时期学校的全部学杂费收入仅为4190元(银元)。凡学校有所兴建,总是由其垫款或捐助。其自定年薪为42元,而当时一般教师的年薪在180~240之间,可见其自律之严。而当局局把其所主持的小学与海虞市第三初等小学合并改名为学前小学时,她又毅然主动卸任。从宗秀松身上,完美地体现了常熟文人士大夫传统的人格精神,她(他)们奉献于社会,致力于事业,自强不息,努力奋发,不计个人得失,不思个人进退,重操守,重名节,如果没有浩大的人生追求,是难以达到这种境界的。

三、历代常熟直臣

早在北宋徽宗年间,常熟书生陆徽之就以敢于犯颜直谏名重于时。范成大《吴郡志》卷21载:“陆徽之,字彦猷,常熟人,高才博学,邑中推为乡先生。建中靖国(宋徽宗时年号)初,有诏求直之言。徽之进对,与雍孝闻等力陈时政阙失。唱第日皆马交放。大观末,彗星见,复收拾孝闻等,徽之已卒。”从南宋到元末,常熟方志典籍散佚甚多,许多人物传记材料未能流传下来,到了明代以后,常熟的方志典籍保存下来的颇多,从中可看到不少自强不息,刚正不阿者的事迹。比如鱼侃,永乐年间进士,官至开封知府,人称其耿直刚正可比包青天,又修德养性,不取钱财,清贫而卒,时人公誉为“第一清官”。清初邑人王应奎《柳南随笔》卷3记载道:“吾邑鱼公侃,字希直,居官廉明正直,人比之包孝肃。自开封守致仕归,随身止一竹箱,箱内存俸银八两。适学宫宣圣前缺香炉、花瓶二物,公即以此银铸之,炉、瓶至今尚存。居家饔飧不继,家人愠见。公偶感得疾,日卧一小床,足不能履地。家不畜仆妾,起居无扶掖之者。床悬二絢,夫人间以麦粥进,必曰:‘清官,麦粥在此。’公乃缘絢以起,食竟,复缘之就枕。其苦如此。歿而仅存葛衣,竟用以殓焉。墓在北门报慈里。崇祯丙子(1636),直指使者路公振飞行部至吾邑,谒墓致祭,且立石碣,曰:‘第一清官鱼公墓’。同时立碣墓门者,一为仲雍,一为子游,与公而三云。”像鱼侃这样的贫苦清官,在有明一代确实很少见,别人由知府致仕,大多中饱私囊,钱财货物往往车载船运,然后高唱“归去来兮”,脱离风浪险恶的宦海官场,返乡修筑府第香巢,优游林下,赏花品曲,安度晚年。两相比较,就更显出鱼侃人品德行的难能可贵。

明清以来的常熟士大夫中,不仅颇多品行高洁、严于律己者,而且还有不少见义勇为、刚正不屈者。比如徐恪,任南京工部侍

郎,为三品京堂大官,地位不可谓不高。然他身居高位,不记苍生疾苦,不忘为宦济民的责任。当这种济民责任与他的官场地位之间发生冲突时,又能够出于公心,坚持正义,甚至敢冒丢命的危险而犯颜进谏。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使他成为常熟文人中顽强不屈的榜样。《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6“奏疏类”中载录了徐恪冒死上奏的《请召回苏松织造使臣疏》,其文曰:

今之南京并苏、杭、嘉、湖等府,即古吴越之境,租税之出,数倍于他州,而绉绮锦绣之贡岁有常额。上供六宫之用,下充四夷之赏。近又差内臣往彼织造乘舆服御,所用无凡,而工役科派,所费不貲。禁闼近侍,势位尊严,府县奉承,惟恐或后。一应财物,非天降地涌,皆民之膏血也。若不蚤为苏息,诚恐民不堪命,怨读言由之而起,祸福倚伏,不可预测。大禹恶衣,文皇卑服,千载之下,犹仰盛德。皇上临御未久,春秋鼎盛,方躬行节俭,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之故,远遣内臣,劳东南之赤子乎?伏睹皇上即位,首颁明诏,特裁苏杭等处织造内外人员即使回京。是以宣布之日,远近闻之,莫不欢欣鼓舞,以谓圣德之厚,烛知民隐。曾未三载,复此差遣,民有为之不终之吧。此微臣所以不避斧钺,冒昧上言,乞敕该部计议,合无仰遵明诏,俯察下情,仍将差去织造内臣取回,余剩丝料,发与各府,准作岁造支用。仍令彼处巡抚巡按,咨访舆情,凡可以轻徭薄税,息民养兵及防微杜渐之计,悉听举行。不作无益,与民更始,庶几应天以实,而灾异可弭矣。

如此慷慨陈辞、为民请命,充分表现出当时文人士大夫中浩然正气,这也成为常熟文化中的一种优秀精神传统。这种传统从明到清,代代相传。尤其在时局板荡、国家存亡之际,常熟文人士大夫和平民百姓中见义勇为、义不容辞以及顽强不屈的精神表现得特

别突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等爱国的革新先驱者遭到血腥镇压,后党势力猖狂,朝中士大夫噤若寒蝉。在此“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常熟文人沈鹏凛然拍案而起,上书请杀三凶(指后党中的荣禄、刚毅、李莲英),朝野震动,士人称快,充分显示出常熟文人大义凛然,奋不顾身的英雄本色。

四、寓居者的影响

应该指出,常熟文化中刚强不屈的精神传统也受到外来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影响。王应奎《柳南续笔》卷四“虞邑流寓”条云:

龚诩,字大章,昆山人。靖难兵破南京金川门,先生时为守戍卒,大哭恸云。会按籍勿伍,法令甚严。先生夜走常熟任阳,投马、陈二氏,匿大园中。即园中读书,焚香继晷,多所纂述,越二十余年,禁稍解,乃仍归故里。周文爰公高其品,两荐为学官,坚不应,年八十有八卒。事详《梅花草堂人物志》及《列朝诗集小传》。顾炎武,字宁人,昆山人。乙酉(1645)之夏,奉母避兵于常熟之语濂泾,见《亭林集·与馆中诸公书》。又云:“余少居昆山、常熟之间。”见《日知录》“行盐”一条。又徐司寇《憺园集》有家兄孚若诗序,中云:“舅氏亭林先生,避兵常熟之穷乡,兄往依之。”意司寇所谓穷乡者,即语濂泾也。而《亭林集》中,又有《常熟归生晟、陈生芳绩书来,以诗答之》之作,其诗云:“十载江村二子偕,相逢每咏步兵怀。”所谓“江村”,非即语濂泾而何?则知先生之寓,居于常熟,始自乙酉岁,后遂久淹于此,故云十载也。刘永锡,字尔钦,号刺庵,魏县人,中崇禎丙子(1636)乡试,选长洲学政谕。鼎革后,不复归,隐于阳城湖之滨,以卖席自给,见者呼“席先生”。钱尚书念其穷,招之往,不应。越几年,竟饿死。事详沈归愚学博《刘先生传》。

这段文字记载了从明到清三位义士避居常熟的事迹,他们是龚翎、顾炎武和刘永锡。这三位高洁之士显然感动了常熟人,尤其是富于正义感的常熟文人。据史载,清顺治二年(1645)七月,顾炎武的养母王氏听到昆山和常熟县城被清兵破占领,就在常熟唐市镇语瀛泾的寓所里绝食自尽。她在临死前叮嘱儿子道:千万不能变节去做满清的官员。顾炎武跪听受命,铭记在心。后来清廷为了收买人心,笼络人才,屡次派人到常熟唐市请顾出来做官,但均遭严拒。顾炎武终身不仕,保持气节,很长时间在唐市授徒讲学,著书立说,现在的“亭林书院”就是他当年讲学的地方。顾炎武在唐市时还与当地文人秀才交往密切,谈诗论文,砥砺节操,互相勉励,一时颇有影响,特别是其高尚的人格精神,更是被常熟人津津乐道,长久流传。

五、常熟人民的光荣传统

应着重指出的是,常熟文化中刚强不屈的精神,不仅反映在文人士大夫的言行中,而且还普遍反映在平民百姓的行为中。比如在统治者横征暴敛,百姓难以忍受之时,平民的豪侠义士就会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不畏强暴,带领农民进行英勇的反抗斗争。清道光年间,碧溪佃农徐二蛮带头反抗县府兵差的逼迫租赋;金德顺率佃户抗交县府增加的军粮;宣统年间,王庄农民周天宝组织“千人会”,联合抗租,遭到县署军警镇压拘捕后,忍受毒刑拷打,坚毅刚强,宁死不屈,终被杀害。后“千人会”斗争仍持续数月,以减租终。又如在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中,邮电工人领袖顾治本(1906~1927)、铁路工人领袖曹元标(1905~1927)、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组织者宋瘦竹(1905~1928)、石楚材(1907~1929),皆以英勇不屈的精神,在常熟文化史上留下了悲壮的一页。再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常

熟人民英勇抗击侵略者,男女老少人人皆兵,江南鱼米之乡,成为侵略军的坟墓,田野河汉芦荡又成为打击侵略军的战场,涌现出无数抗日英雄。如黄小生(1914~1938)、端木瑞英(1910~1941)、徐青萍(1913~1941)、朱爱农(1918~1941)、茹春华(1916~1945)、鲍志椿(1914~1944)、薛惠民(1917~1945)、茹慰农(1916~1945)、李建模(1907~1945)、戈仰山(1915~1947)、徐政(1914~1948)、叶小七(1906~1948)、任天石(1913~1948)等等,他们在与日寇的斗争中,英勇不屈、大义凛然,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并以鲜血与生命书写出了许多气壮山河,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他们的英勇顽强与不屈斗志,同样构成了常熟文化中的优秀精神传统。

常熟文化中刚强不屈的精神传统,在当今常熟的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在经营企业、商品竞争中,更需要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一方面来之于丰富的经济知识,另一方面也与坚强的意志以及坚韧的毅力密切相关,当代常熟经济的起飞离不开这一重要因素。

第四节 知识为本——常熟的奥秘

一、教育发达

常熟素以教育发达著称,其教育事业的发展,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言偃北学南归、传播儒学。教育的发达使常熟地区涌现出大批出类拔萃的人物,并普遍产生了尊重知识、追求知识、以知识为本的社会风气。自从隋文帝实行开科取士后,言子三十八世孙言大章首领风骚成为常熟第一位进士。随后,又有陆器在科举中一举夺魁,成为常熟历史上首位状元。到了明清时代,常熟榜名高悬,盛况空前,全国闻名。据民国三十五

年(1936)丁祖荫主修的《重修常昭合志》统计,历代常熟有唐进士1人,宋进士83人,明进士228人,清进士159人。另据今人周公太《常熟历代进士考略》一文考证搜稽,又增补出12名进士。这样,常熟从唐代到清代的进士人数为483人。常熟的科举及第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第高,据统计,历代常熟有状元8人,有榜眼4人,探花5人,传胪4人。今人缪进鸿在《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比较研究》一文中,对先秦以来全国300多位杰出专家学者的地区颁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常熟籍的有25人,占总人数的1/12左右,常熟在全国四百多座城市中名列第14位。该文还对明清两代出巍科(会元、状元、榜眼、探花、传胪)较多的城市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常熟与北京、南京一起并列第六。常熟历来只是一座小县城,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科举成绩,确实能证明常熟文化的广博深厚,常熟教育的兴旺发达,以及常熟人崇尚读书的普遍风气。

二、著述浩繁

常熟文人科举及第,步入仕途后,大多仍保持好读书勤做学问的习惯,这成为常熟文人中代代相传的良好风气。南宋时常熟人崔敦诗,绍兴年间进士,早有文名,史称其“议论疏通知大体”。隆兴年间,当时名贤、国史院编修吕祖廉奉敕编选《皇朝文鉴》,因该工程卷帙浩繁,众说纷纭,难以定稿。最后特诏崔敦诗删节定夺,才得以平息众议,并通过钦定刊行。由此见崔敦诗文章学问之广博深厚,已达到了文宗权威的程度。明代常熟人张洪,进士及第后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与另一位常熟人陈济一起奉命编辑《永乐大典》,经过6年区分钩考,终成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成为一部划时代的空前巨著。明末常熟人钱谦益,著作较多,人誉“文宗”,所编《列朝诗集》100卷、所著

《初学集》100卷、《有学集》50卷,皆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清初常熟人汪绎,为康熙三十九年(1700)状元,被授为翰林院修撰,他奉诏与李光地等纂修《朱子全书》66卷,后以“御纂”名义颁行全国。后来又奉诏与在籍翰林官10人校刊《全唐诗》,遂编纂出这部煌煌巨著,收录唐五代诗达48900余首,成为不朽的传世佳作。

常熟的文人爱做学问,所以历代常熟人编写的书籍特别多;常熟文人又尊重知识,所以历代常熟的藏书家特别多。像明后期的毛晋,就是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清代后期的常熟人张金吾,也同样是布衣中的大学问家。张金吾少从季父张海鹏校群书,考据精赅。后来他经过广搜散佚,辑得《金文最》120卷,录存金代骈散文共42类,为全国搜辑金文最为完备之书。他还著有《两汉五经博士考》、《十七史引经考》、《白虎通考》等,为学者所重视。上述这些文人的勤于笔耕,皆反映出历代常熟人重视知识,重视文化的普遍风气。

当代常熟文化人的著述浩繁同样引人注目,我国著名学者、古代文学研究权威钱钟联教授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钱钟联生于常熟,在常熟文化环境中长大。之后,钱钟联去无锡国专求学,再去上海诸大学任教,交游日广,见识也愈深,并开始了其笺注前人诗集的工作。

笺注是一门专门之学,涉及到作品本事,征典必须用最早的材料,佚书也要从古注本及古类书转引,必须注明来源,要断制简括,不尚繁琐;还要寻究诗人借鉴前人作品的脚根,这就需要横向广搜作者同时交游者的身世及唱和之作;更要全面掌握作者的家庭、人生经历、思想倾向、社会背景等。钱钟联教授在这方面的工作成就,在国内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其主要著作有《人境庐诗